

编者按：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70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在各级党委、政府大力支持下，经过几代方志人不懈努力，新方志事业取得巨大成就，新方志学建设也得到巨大发展。为纪念建国70周年，本刊特设“新方志70年”栏目，刊发《论董一博对新方志学建设的贡献》《傅振伦与方志序跋》两文，总结董一博、傅振伦对新方志学建设之突出贡献，展示70年来新方志学建设历程与实绩。

论董一博对新方志学建设的贡献

王复兴

提 要：董一博足迹遍及全国十几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他深入修志第一线调查研究，宣传、指导修志工作，写出了160多万字的方志论文和讲稿。董一博为新方志学建设作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关于地方志的科学属性，关于地方志的功能作用，关于构建方志学理论体系，关于彻底改变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关于史志关系，关于编修地方志的指导思想，关于地方志的持续发展，关于地方志的体例篇目，关于概述，关于方志资料工作，关于方志评论，关于旧志整理。我们缅怀董一博，不仅要学习他的方志学理论，更要学习他热爱方志事业、全心全意为方志事业作贡献的精神。

关键词：董一博 方志事业 方志学

董一博是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中国地方志协会副会长。自1981年迈进方志门槛后，他全身心、忘我地投入新方志的宣传、编纂及理论的指导工作中去。1982年，他在《人民日报》发表《要重视编修新地方志》的文章，向全国宣传修志。他两次上书胡耀邦总书记，引起中央领导对修志的重视，从顶层解决了修志急需的领导、机构、条件等关键问题。短短六七年内，他足迹遍及祖国南北十几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深入修志第一线调查研究，宣传、指导修志工作。他联系了数以千计的方志工作者，了解他们的工作和思想，授业，解惑，鼓劲。他是社会主义新方志事业和新方志理论的建设者之一，是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初期杰出的推动者。

按照《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规定，第二轮修志即将结束。经过两轮修志的实践，现在回头再学习董一博有关方志工作的讲话和阐述方志理论的文章，联系当时的形势和我们走过的道路，更感意义重大，而且许多理论论述，特别是引进其他学科理论的论述，现在仍有重要指导价值。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是在缺乏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理论准备的情况下仓促上马的，而且发展迅猛，短短几年内，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县几乎都成立了地方志编委会或办公室，调集人员，开始编纂新地方志书。全国专职修志人员约有2万人，兼职修志人员更多达10万人。这么多人几乎都是首次参加修志，迫切需要理论指导。董一博凭借他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广博的文化科学知识，吸收旧志编修和旧方志理论的积极成果，总结编修新方志的经验，根据修志实践的需要，不断创新、发展新方志理论。他在各地各级会议上的讲话和发表于全国各类刊物上的文章，密切联系修志实践，解决了方志编纂中的诸多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及时遏止了修志人员认识中的和修志工作中的不正确苗头，指明了方志编纂和方志理论研究的正确方向，对避免出现不合格志书、提高新志质量，最大限度地发挥方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起到了非常积极、重大的作用。

董一博的方志研究涉及方志理论的各个方面,特别是他引进现代科学最新成果,拓展了方志理论研究的领域。他为社会主义时期新方志学的建设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本文分12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述。

一 关于地方志的学科属性

关于地方志的学科属性,历来认识不一。古代主要有地理说和历史说两种。古地理书是方志的源头之一,地方志早期的地记、图经等形式,内容和体例与地理书接近,宋代以后较完备的方志中也保存了不少地理书的内容。所以,有些人主张地方志属于地理。清代的戴震是地理说的代表,他指出:“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①古史书也是地方志的源头之一,宋代以后较完备的方志,在体例、内容和写法上更接近史书,所以有些人主张方志属于历史。清代的章学诚是历史说的代表,他指出:“志属信史”^②“志乃史体”^③“方志乃一方全史”^④。民国时期出现了史地两性说,以黎锦熙为代表。他在《方志今议》中写道:“方志为物,史地两性,兼而有之;唯是兼而未合,混而未融。今立两标,实明一义,即方志者,地志之历史化,历史之地志化。”^⑤

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伊始,许多人赞同历史说。一开始,董一博也持此观点。1982年,他在河北藁县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第4期地方志研究班开学式上的讲话中说:“我们所以说中国地方史志重要,并不是在于职业的优越感,而是因为它是中国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和基础。”^⑥他在《论地方志的继承与创新》一文中写道:“地方志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⑦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认识的提高,他独立思考,改变了“方志属史”的观点,提出了地方志是独立学科、边缘学科和综合性应用学科的观点。他在《对修志工作中几个理论问题的看法》一文中写道:“地方志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兼具史、地之长和自然科学的内容,是一种跨学科的边缘学科,也可以划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学科。”“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地方志自身发展的需要,它必然在争为归属的母科学中勇猛而自由地独立出来,成为新兴的独立学科——方志科学。”“地方志是一门边缘学科,它既跨步于社会科学范畴,又与自然科学有着密切关系。”^⑧他在《回顾与思考》一文中写道:“新编地方志,它是记述一代一地自然、社会、人文、百科之业的历史和现状的综合性应用科学。”^⑨1985年,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方志干部专修科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说:“我曾公开声明过,我们的学科既不姓地,也不姓史,而是理直气壮

① 章学诚:《记与戴东原论修志》,张树棻纂辑,朱士嘉校订:《章实斋方志论文集》,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印,1983年,第31页。

② 章学诚:《修志十议》,张树棻纂辑,朱士嘉校订:《章实斋方志论文集》,第50页。

③ 章学诚:《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张树棻纂辑,朱士嘉校订:《章实斋方志论文集》,第36页。

④ 章学诚:《丁巳岁暮书怀投赠宾谷转运因以志别诗》,张树棻纂辑,朱士嘉校订:《章实斋方志论文集》,第324页。

⑤ 黎锦熙:《方志今议·次立两标》,《方志学两种》,岳麓书社,1983年,第21页。

⑥ 邵长兴编:《董一博从事方志理论与实践活动纪事》,董一博:《董一博方志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482页。

⑦ 董一博:《论地方志的继承与创新》,《中州今古》1983年第5期。

⑧ 董一博:《对修志工作中几个理论问题的看法》,《中国地方志通讯》1984年第4、5期。

⑨ 董一博:《回顾与思考》,《董一博方志论文集》,第472页。

地姓志!”^①他在《新方志编纂探微》一文中写道:“新方志学科是从地理和历史稳固、丰富的成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既有地理学科的内容,也有历史学科的内容,而且是经过改变和提炼了的内容。……它不仅具有地理、历史的属性(但已经不是本质属性了),而且是具有多学科内容的多学科本质属性的实用科学。”^②

董一博的这些论述,使我们有耳目一新之感,给我们很大启发,不仅深化了我们对地方志学科属性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从学术思想上开拓了思路。在他的倡导和带领下,方志界研究地方志学科属性的学术空气甚浓,大家各抒己见,互相切磋,甚至公开辩论,提出了一些新见解、新观点,主要有政书说、信息论说、地情书说、百科全书说、资料书说、一方古今总览说、资料性著述说等。其中资料性著述说得到大多数专家学者和方志编纂者的认可。后来起草《地方志工作条例》时,又专门召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明确地方志的定位为“资料性文献”,外延则包括地方志书(含各级各类综合志书和专门志书)和地方综合年鉴。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当然,这个定义更多是从工作层面提出的,学术层面的争鸣仍在继续。

二 关于地方志的功用

董一博在讲话和文章中反复说明,为什么要编修地方志,为什么地方志编修两千多年来绵延不断?根本原因是它具有实用性。他认为,地方志的诸多特性中,实用性是最重要的一条。他说:“有很多人说法方志有各种性,地域性啊,时代性啊,科学性啊,可就是没有说它的实用性。我认为,加上实用性,才能使地方志真正起到资政、教育、存史的作用。”^③“‘应用性’是地方志的根本属性。”^④又说:“用”是地方志的主体,新编地方志“最基本、最核心的要求在于‘用’。如果离开了‘用’便丧失了它应有的价值”^⑤。

他指出,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把地方志看成是“辅治之书”^⑥,即所谓“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历史上,统治阶级中比较有头脑的政治家和官吏,常常把地方志作为做官的教科书。所以有韩愈过岭南,先借《韶州图经》;朱熹下车,首以《南康郡志》为问的佳话。清人编的《吏治悬镜》讲新官上任要奉行的23项“莅任初规”,其中第三项就是“览志书”。^⑦

即便在现今,旧方志仍有重要作用,董一博总结归纳为12个方面:一是巨细毕载,一方全史;二是利弊治乱,鉴往知来;三是山岳湖河,形貌尽收;四是人丁田亩,丰歉有记;五是风土民俗,因情施教;六是方物矿产,规划民生;七是典章制度,识辨政绩;八是人物贤否,彰善瘅恶;九是贫困灾患,兴革有则;十是史删讹误,拾遗补阙;十一是诗文碑刻,文物教化;十二是年鉴资料,志忘备证。为说明旧志资料的重要价值,董一博还多次在讲话和文章中举一些旧志资料发挥作用的实际例子。

① 董一博:《在北京师范大学方志干部专修科开学典礼大会上的讲话》,《董一博方志论文集》,第269页。

② 董一博:《新方志编纂探微》,《董一博方志论文集》,第313页。

③ 董一博:《在滕县谈地方志工作》,《董一博方志论文集》,第363页。

④ 董一博:《回顾与思考》,《董一博方志论文集》,第475页。

⑤ 董一博:《论彻底改变思维方式创新体例》,《董一博方志论文集》,第436页。

⑥ 李奉翰:乾隆《永平府志·序》,卷首,乾隆三十九年(1774)刻本。

⑦ 参见董一博:《在滕县谈地方志工作》,《董一博方志论文集》,第362页。

对于编纂新地方志，董一博也反复强调“用”。他指出：“‘用’就是我们的着眼点，也就是我们的历史任务，如果说要突出地方志的特性，最根本的是突出‘用’的特性，其他也都是为‘用’服务的，为现实的‘用’，为历史的‘用’，以及各种最广泛、最实际的‘用’。”^①他把新地方志的功能作用总结归纳为5个方面：一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史情、现情、地情、国力的信息，作为抉择最优方案的参考。二是为体现经验教训，反映客观规律，提供借鉴与规诫。三是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为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道德传统，提供乡土教材。四是为一代一方的自然、社会、人文以及百科之业的历史和现状，建立资料总库。五是为一代一方自然、社会的变化，文化科技水平，认识程度，物质生产及百科之业的发展状况，人物活动及其事业，树立断限里程碑。他在对每一方面进行说明时，不仅有理论阐述，而且举全国各地的实例，令人信服。

董一博在各种场合关于地方志功用的阐述，对向社会和领导宣传编纂地方志的意义，增强方志工作者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提高方志工作和方志事业的地位，发挥了积极有力的作用。

如何用极简短精练的语言把地方志的功用表述出来，董一博下了一番研究探讨的功夫。先是，他从前人那里得到启发。他说：云南一位于老先生45年前将地方志的作用综合为6个字：“资治、教化、备查”，甚为精湛。他借鉴来并将其改为“资政、教育、存史”^②。后来，经董一博、朱文尧等人反复斟酌研究，确定表述为“资治、教化、存史”。1986年中国地方志协会学术年会纪要中用“资治、教化、存史”6个字，基本上概括了志书的功用。方志功用也是新方志编修初期方志界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提出的观点还有决策、借鉴、兴利、认识、信息、积聚、传承、旅游和窗口等。虽然六字功用并非尽善尽美，但它反映了方志功用的精髓，涵盖了方志功用的基本方面，得到大多数专家学者和方志工作者的认可，逐渐成为方志界流行语。董一博对此作出了贡献。

三 关于构建方志学理论体系

董一博非常重视方志学理论建设。他认为只有在正确理论指导下，方志事业才能健康发展。他指出：“方志工作的理想和方志理论，是方志工作的指针和迷津宝筏，它确定着方志工作者的奋斗目标和目的，它可以载送方志工作者抵达新方志编纂成功的彼岸！……方志理论，是方志工作者的首要问题，尤其在编纂过程中是必须首先解决的关键问题。”^③他认为，几年来所有方志编纂中出现的偏差，大多由盲目性造成的，最根本的一条，是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有人说，我们本轮修志，在政治上、大方向上没有错，其他是微不足道的。我们说，政治很重要，但不是唯一的東西，尤其不能用政治代替科学和学术问题。正由于有些人不重视理论研究，不肯艰苦地研究学术问题，使我们的理论水平不能提高，志书的质量还有问题。他又说：“科学的理论，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之上产生并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和证明的理论，是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性的正确反映；它是同错误理论不断进行斗争中发展起来的。”^④他认为，新方志理论工作，在当时仍处于拓荒之中，如新编地方志的性质、功能、科学性、现代性、与经济改革的关系、方志方法论、

① 董一博：《论彻底改变思维方式创新体例》，《董一博方志论文集》，第437页。

② 董一博：《群策群力修好新方志——在厦门市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董一博方志论文集》，第283页。

③ 董一博：《论彻底改变思维方式创新体例》，《董一博方志论文集》，第431页。

④ 董一博：《论彻底改变思维方式创新体例》，《董一博方志论文集》，第432页。

方志的应用性等,均有待于深入研究探讨。

董一博分析了当时方志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从整个方志界来说,方志理论的研究工作是极其薄弱的,在这个学科里,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完全渗透它的各个方面。方志学的著作虽多,而对学科学的研究则极少,基础十分薄弱。方志理论整体结构的研究、方志学方法论的研究更属少见,甚至被忽视。因此,他提醒方志工作者,建设马克思主义的方志学理论体系,要做长期的、艰苦的努力。他在这方面作了积极探索,在《探索创新方志总体论》一文中,提出方志学的整个理论体系一般分三个层次:方志观、方志学和方志学方法论。它们以丰富的理论系统构成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但各自研究的对象不同。方志观,是新方志理论的核心,也是它生命的所在,它是人们对方志总体运动及其规律性认识的哲学概括。马克思主义的方志观,是我国方志工作者研究方志的主要理论根据。方志学,是对方志学研究的目的、社会作用和具体内容的理论结构的逻辑概括,它侧重于为什么研究方志学和怎么研究方志学的问题,同时指出研究工作必须遵循的立场、原则和方法等问题。方志学方法论,是方志工作者特有的认识工具,是形成方志工作者研究能力的要素和保障,并促使方志工作者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科学化、规范化、多样化,提高效率,提高素质,从而使方志工作者的主体认识同客观事实及其发展规律尽可能趋于一致。而方志观、方志学都包含着基本的方志学方法,但是方志学方法的内容,则较方志观、方志学更为具体、实际和丰富。如果说,方志观是决定研究的方向是否正确,方志学是指导研究的成果如何为社会服务;那么,方志学方法论则是决定研究所能达到的深度、广度及其效率、素质。

随着实践的丰富和认识的深化,董一博对方志学理论体系又提出新的构想,他称为“三个基础工程”,又称之为“支持新地方志学科的三大支柱”^①,即理论方志学、应用方志学、方志学发展史。理论方志学:主要研究方志观和方法论。方志观,即对方志总体运动及其规律的概括,是理论方志学的核心。方法论,是方志工作者的思想方式、研究方法、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从而探讨规律,总结经验教训等。应用方志学:研究方志的目的、功能、社会作用、具体内容、理论及实际结构、逻辑概括、应用效益研究等。方志发展史:是理论方志学和应用方志学及其自身相互联系发展的总体。以上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一个整体,共同构成了方志学基本理论体系,对创建方志学产生了较大影响。

董一博还提出要加强三方面的研究:理论研究、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理论研究包括两方面:一是方志观的研究。是指研究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灵魂的方志理论,具体说就是研究志观之是非、志材之真伪、志法之臧否、志言之宏鄙、志德之崇庸等,这是方志理论研究的核心理心。二是方志学方法论的研究。包括的范围相当广泛,特别是比较方法论,新老比较、中外比较,方志学的方法论与兄弟学科的方法论的比较等,以丰富、完备方志学科的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和先进化。他指出,加强方志学方法论的研究,须从四方面着手:第一,加强方志理论总体结构的研究,明确方志学方法论在方志研究和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继承和发展唯物史观的基本研究方法。第三,在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得到营养和改造,并发展创新方志研究的方法。第四,对各学派的学术成果,采取分析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充分利用,借以纠谬补缺,发展提高方志学方法论的研究。

所谓基础研究,是泛指事物的根本起点,这是工作的根本功底问题。由于地方志覆盖面广,要记载古今上下、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囊括一代一方的范围,也可称为负荷超重的载体,这就要

^① 董一博:《回顾与思考》,《董一博方志论文集》,第461页。

求编纂工作者有广阔的知识面，有深厚的知识基础，还要懂点新兴学科。

应用研究。应用性是地方志的根本属性。因此，对地方志的应用研究，必须认真深入地开展，具体落实。地方志书，每一编章节目都应闪射着“用”的光芒。因此，在落实编写每一编章节目时，都应着眼于鉴古用今，信今传后的大问题。这个“用”字，并非停留在理论阐述、问题分析上，而是寓在横排竖写的各种事实之中，说明与记述本地，就是为了用于本地、开发本地与振兴本地。

从董一博开始，方志界对方志学理论体系进行了一些研究，但还很不够，可以说这是研究比较薄弱的方面，而这个方面对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新方志学又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后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四 关于彻底改变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

董一博指出，近年来，在方志编纂方面出现了不少问题，在学习过程中初步认识到，这其中有继承传统问题，有引进新的学术成果问题，最重要的是旧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旧的模式捆住了我们的手脚。如果不积极探索、开拓、改革和创新，对旧的思维方式、旧的模式有所突破，从盲目性中解放出来，就不可能开拓前进。

他说，众所周知，新编方志与旧方志相比较，各方面都有着大小、深浅的变化，甚至是质的变化。因此，人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也应因环境条件等的变化而变化。今天修志与前代迥然不同，最基本的是时代不同、社会性质不同、所志对象不同、对志书的任务要求不同、对许多问题的观念认识不同。因此，对修志者来说，也必须因时代变化而变化，特别是思维方式的变化。

他认为，随着实践和认识的发展，思维方式和方法也必然随之向前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志稿的记载，大都限于感觉这一阶段，没有达到思维阶段，或者仅限于抄录他人的结论，没有达到理论的认识。正确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有条件有要求的，以下几点，可以导向正确之路。

（一）民主思想。这里所谈的民主，首先是自我观念上的民主，要完成修志任务，最主要的战略决策是调集众智众力，它是叩开新编方志困惑之门的金钥匙。修志以来各方面取得的经验，无一不是通过民主方式取得进展稳定下来的；各方面的成绩，无一不是通过民主方式，调集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发展工作，解决问题而进步的。正由于民主开了先河之路，思想才得以解放，思想解放了，什么专断、臆测、迷信、盲从、门户之见、框框禁区，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东西，就会像秋风扫落叶，概予抗拒和祛除。地方志的发展事实告诉我们：哪里有民主，哪里就会绽放智慧之花，哪里的工作就有进步、有发展。

（二）科学态度。地方志书是一部鸿篇巨制，既需要哲学、史学和文学，也需要其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百科的专业科学为组织研究、叙述记载的支柱，一句话，它迫切地需要广义的科学。地方志并不揭示规律，它只反映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体现经验教训。它把观点寓于对事实的记述之中，不亮褒贬之笔。地方志书自始至终都是观点、资料和科学方法的结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其交叉科学等，无不以各自的严密而新颖的科学方法而丰富方志学科。可以说，新编志书，如果没有科学，不体现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就不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三）变革精神。宇宙、人类社会、万事万物，时刻处于变化之中，变是总的规律，不变是没有的。旧志记载的自然和社会与现今相比，自是人事沧桑，变异迭出。今天已不可能再用旧的

体例模式和写法去记这些对象。要想变通，就必须改变，适应客观的变化。首先从主观做起，改革现状，改革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在新方志编修中，抛弃束缚前进的旧传统、旧观念和旧模式，创新体例，创新方法，贯彻“三新”原则要求。

（四）实践第一。新方志编修之初，没有把实践理论进行认真研究，引入修志工作中，不大懂得实践对于世界的改造作用，尤其没有把实践作为认识论的基础，作为革命的反映论。修志的头两年，一般是依靠专家，依靠书本，尚不懂得到实践中去总结经验，主观上认为在启蒙时代无经验可总结。实际上，下面不是没有经验，而是经验丰富得很。一切知识都是在实践中获得的。社会发展了，人们的认识也发展了，而且总是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向前发展。没有修志的实践，不会写出那么多经验总结和宏文大作，不深入实践，永远不会取得经验。

董一博认为，要改变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就必须彻底改革，不改革就不能冲出困闭圈圈，而改革的根本路子，仍然需要从哲学、科学和技术领域范围里找答案。第一，哲学问题。地方志的任务之一，是用唯物的反映论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地方志自身也有个世界观问题，即志观之是非问题。而志材之真伪、志法之臧否、志言之宏鄙、志德之崇庸，则统属于在志观的指导之下并把握地方志的特性，达到真正认识地方志及编纂地方志的目的。世界观是哲学的最高问题，也是根本问题，其核心在于“识”，“识”就是问题的最高层次，这里也是居三段论原理的最高层次，解决地方志是什么的问题。第二，科学问题。用科学来改造主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这里是指社会主义革命的改造问题，其核心在于“变”。“变”是三段论原理中的第二层次，是解决地方志为什么和能不能的科学规律问题，即为什么要修志，能不能修出一代名志。第三，技术问题。我们的现实任务要求修出一部名志，这样的志书究竟应怎么修法，用什么形式、什么方法去修，故在哲学、科学问题解决之后，方法问题则是主要矛盾，工作也是大量的。如果说，指导思想和修志宗旨是哲学问题；方志体例则是哲学和科学问题，科学是主要的；制订篇目、具体撰写，是在哲学指导下的科学活动，但最大量的则是技术方法问题，其方法中的核心问题在于“制”，就是要在技术、方法、文字等的联系运动上的协同机制，是三段论原理的第三个层次，也是最后一个层次，是解决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也就是修出什么样的志书、怎样去修这部志书的问题。上面谈到的“识”“变”“制”三段论原理，它们既是独立的，又是向心的联系的整体，其三段“因子”活动则是相通的。特别在地方志中，对这个原理的应用是十分必要，也是不可分割的。

董一博指出，为改变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应注重引进新兴的科学方法论，主要有系统网络分析法、结构功能分析法、层次分析法、中介分析法、模式分析法、有序无序过程分析与开放式多元研究法、多学科研究法、定性定量结合分析法、比较法、唯物辩证法等。还必须在四个方面进行清理，即肃清极“左”思想，扫除封建意识，努力净化思想，更新旧观念。

董一博提出的彻底改变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的命题及其进行的阐述和研究，在当时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并对后来的方志编纂和方志理论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它开阔了方志工作者的思想，拓宽了方志工作者的视野，使方志工作者认识到方志编纂和方志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并逐步认清前进的方向，从而促进方志事业的发展。现在和以后仍要重视这方面的研究。

五 关于史志关系

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之初，许多方志编纂人员对新地方志到底什么样，史与志有什么区

别,心中不是很清楚,致使1984年6月香山5部志书评议会上,出现了以“史”代“志”的志书。到1984年7月黑河15部志稿评议会又出现类似问题,大家认识到辨别清楚史志关系的重要性,于是在方志界展开讨论。董一博认为,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史与志的关系进行探讨。

(一)本质属性及其任务。地方史是反映地方历史的本质属性。它以地方历史(通史、断代史、专史)为对象,根据文献等资料,进行深入论述,对其所论断的人、事、物或问题,以其发生、发展,阐明自己的观点,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探索其客观规律。它长于论断,其方式方法,都是为它的目的任务服务的。地方志则不然,它是以地方的自然、社会、人文及百科之业的历史和现状作为记述对象,并以这一广泛的对象,通过资料的研究提炼、分类排比,记其发生、发展、运动的线索和现状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它不加讨论分析,只是大量、全面的资料纪实,而观点、思想及其美恶褒贬,均寓于记述之中。这样便自然而然地体现了经验教训,反映了客观规律,成为存史、资治、教化的资料宝库。

(二)体例及其特点。一是编写任务和方法、形式各自有体。史主要记过去,一般以时间、事件、人物或问题为中心轴线,以论断方式,纵向发展,在大量资料基础上,找出最有说服力的资料,通过历史现象及其事实的分析研究,探索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总结经验教训。在论断过程中,可以尽情讨论,深入阐发。因为论述是史书的主体,其所征引的文献等资料,主要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发明、发现及其对事物问题的主张。志也追溯过去,但主要是记述现状。它以记述为主,分门别类,目以类归,两级或三级分目,各级平行,横向展开。它直记其事,不作论述,如有褒贬,也寓于记述之中。志的基础是资料,必须广泛调查、收集,并经整理鉴别后,分门别类,不加任何水分地记载下来。它没有总结经验教训和探讨客观规律的任务,而是予以体现和反映。

二是立体门类各行其是。史以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为中心轴线,议论深入、系统,对材料的取舍、记述详略等,一概服从并取决于中心轴线的需要。本此,作者可以使用和排除一些资料,来集中证明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志则以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见长。举凡一地之自然、社会各个方面,只要关乎国计民生的发展变化,以及人物、事件的重要资料等,都在记述范围之内。分级排列,横排竖写,类目间无明显的统属关系。志要体现地方特点和时代特点。在取材方面,量体裁衣,无多少大小之分,但在表现特点及典型问题时,有轻重深浅之别。

三是内容详略随体而定。一般说,史的范围较专较约,志的范围较广较博。史立论列,如对人、事、物或对某一问题的讨论,只限于其所论列的对象范围取材,或引征文献,或使用资料,都要围绕其既定的要求目的,故约而不泛。志属编纂,如编纂某一县志,则该县自然、社会的历史、现状的有关资料,都属于它的博采范围,故取材广而事丰。所谓“史体纵看,志体横看”,也可以说,志为一大片,史为一条线。志为国史要删,史是志之精化。史山之峰,志为基础;志之博取,为史约用。史较单专、简约,志则庞杂、翔实。

四是成书方法有殊。史主要依靠文献、考古发掘去论证过去。志也依据文献资料,但也靠调查采访,广泛征集积累资料,重在记述当前,详今略古,分门别类,各成体系。史以讨论有据而精深见长,志以记述广泛细密见长。志实而史虚。志记类目真实面目,述而不作,不结自结,不明自明;史持据论列,既精密考证,又实地调查,故称为“推理的而兼观察的科学”^①。

^① 董一博:《新方志编纂探微》,《中州今古》1985年第6期。

总之，史与志有联系也有区别。有人把概念不明的“史志体”认为是新创，甚至把志书写成史书或半史书，那就史不史、志不志了。而新方志体是既别于旧方志体，又别于史体，而是从上述体例中脱胎出来，且保留了其中最宝贵的成分，但进行了吸收和改造而成的。

董一博关于史志关系的论述，紧密联系修志实际，阐述得较全面、系统、具体、深刻，容易懂，好理解。经过修志初期的这次大讨论，大家逐渐明白了史志关系，掌握了地方志体例、写法的特点，以后未出现像史而不像志的志书。

六 关于修志指导思想

新方志编修之初，经过讨论，大家认识到，社会主义时期编修地方志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但在如何指导的问题上还有些迷茫。董一博在讲话和文章中多次阐述这个问题，他结合修志实际讲得详细而具体，起到了指点迷津的作用，现在读来，仍觉论述深刻。

他说，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指导修志，不仅要贯穿在修志工作的全过程及其各个环节，而且要体现在修志的最后成果——志书之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搜集、整理、分析、研究和处理编纂地方志的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一切历史资料和现实资料。真实地反映这些问题的本质面貌，要注意摒弃和克服一切历史唯心主义对我们的影响，保持清醒的头脑。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在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中，如何才能去伪存真，不被假象所迷惑，选择到能够反映事物真相和本质的典型资料为我所用，必须借助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社会科学的‘望远镜’和‘显微镜’，特别是在大量的旧方志中，处处渗透着封建主义的毒素，珍宝与垃圾杂陈，精华与糟粕并列，没有马列主义的识辨能力，是难以决定取舍的。”^①他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具体分析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修志的问题。

（一）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人的观点。他分析说，旧地方志的主体是帝王将相、达官显贵、地主豪绅、贞洁烈女，充满了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和腐朽的名权思想。社会主义时期编修地方志，必须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突出人民群众的功绩，记载他们的创造性活动，赞扬他们为革命事业献身的精神，为他们树碑立传。当然，对旧志记载的旧时代的人物，也不能全盘否定，而应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凡是为人民做了好事的在新志书中应如实记载。对那些奸究坏人、血债累累、为人民所痛恨者，应志其恶迹，以取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现在来检视新编志书，绝大多数都体现了这一观点，但也有个别志书存有不当之处。如：将当地旧志所记官员全都移入新志书；人物传中人民群众的优秀代表人物记载太少；人物简介部分所记全是在世当地领导人，组织机构编收记境内所有大小官员，反映出编写者的官本位思想。

（二）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他分析说，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在阶级社会中，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烙印。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编写新地方志时，要注重“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战争等问题，正确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还历史的本来面貌”^②。特别对旧资料，更不能忘记阶级分析，那些事实基本属实但观点错误的资料，采用时要把观点改正确。在两轮修志之后返回头来检查，发现个别新编志书的某些

^① 董一博：《对修志工中几个理论问题的看法》，《董一博方志论文集》，第127页。

^② 董一博：《论地方志的批判继承与创新》，《中州今古》1983年第5期。

地方处置欠妥，如把旧志中为官者的人物传移植到新志书中来，并完全按旧志所写予以颂扬；记载少数民族和农民起义时，仍按旧志所写称为“蛮”“夷”“匪”等。切记，使用旧资料不能带进旧观点。

（三）内容与形式问题。他分析说，内容与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范畴。形式因内容而存在，又是内容的表现方式；内容决定事物的本质和基础。二者既相互作用与影响，又是辩证统一的。地方志在内容上包罗万象，上及天文，下及地理，中及人世，无所不载，但并非一切皆收，而是取翔实之精华，去荒诞之糟粕，且具有时代和地域特点，体现经验教训，反映规律，为存史、资治、教化之宝鉴。其形式，如体例、篇目、资料取舍、行文、章法及写作技巧等方面，历代志书中都有值得批判继承之处。这些方面可以保留的东西很多，当然也不能完全照搬。“形式决定于内容，有了新的内容，旧的形式必然要有所突破，但对旧的形式也不能完全否定，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①“作为形式灵魂的内容，也必须从实际出发。在各个类目中，有什么写什么，有多少写多少，不要为了支撑形式，芜杂牵强地增添不必要的内容。……一种形式可能概括多样内容，一种内容也可以用多种形式来表现。总之，二者都必须从实际出发。力求达到完美的统一。”^②新方志在形式上有所发展。如篇目上，为弥补各分志只记一类事物造成整体性不足而增设述体，包括志书前的概述、编章前的无题述（或称小序）等；为方便查阅利用而增设索引。两轮修志的实践证明，新地方志书的内容和形式基本上是相适应的。

（四）实事求是原则。他分析说，实事求是我们的思想原则，也是我们的工作原则，是方志工作者的科学态度、道德信条，也是职业职责。在地方志领域，有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其中有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也有当前出现的，诸如对历史的认识，对人物、事件的评价等，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何解决呢？最好的办法，一是让真实的资料说话，二是以理服人。真实的资料，是经过认真考证的，是原始的历史。有了这种资料，就有了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依据。所谓以理服人，就是按人物、事件和问题的本来面貌重述真相，不夸大，不缩小，不无中生有。写人物，不以今天的尺度去苛求古人，而是将其放在一定的历史环境条件下，把评论寓于记述之中。编修新志书，应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尽力做到公案有“断”，不给后人留下难题。如果尽了努力仍未做出结论，也应记下做了哪些工作、使用了什么资料，还有哪些问题以及今后意见等。

（五）调查研究。他指出，编修社会主义新志书，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首先，要调查当前的现状，包括本地区的自然环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情况，已掌握资料和所缺资料的情况，志书篇目的设置及存在问题的情况等。其次，要调查历史，包括书刊、档案等文字资料，各种古遗址、石刻、墓葬、古建筑、传说、民俗、掌故，自然灾害、人民祸难、地方上的各种历史问题、政治事件、民间结社、重要人物等。再次，要研究各种经验教训、社会及自然的发展规律。通过调查研究认识地情，为篇目设计和内容的安排奠定基础。在这一方面首轮修志的不足，是较普遍地缺乏调查研究，特别是对当代社会生活中一些热点问题的调查研究，致使对这些问题缺记或记载得若明若暗。今后收集资料，应在调查研究上狠下功夫。

（六）历史遗产的批判继承。他分析说，新方志编修之初，对旧方志遗产的继承主要有3种

① 董一博：《对修志工作中几个理论问题的看法》，《中国地方史志通讯》1984年第4、5期。

② 董一博：《论地方志的批判继承与创新》，《中州今古》1983年第5期。

态度：一是陈陈相因，照抄照搬；二是否定一切，拒绝继承；三是批判继承，参古鉴今，坚定地立足现实，严肃认真地吸取精华，促进创新。就是说，对古人留下来的精神财富，持以清醒的扬弃态度：凡是优良的，予以保留继承，并发扬光大；对待其中的糟粕、有害的不健康的部分，一概摒弃，并引以为戒。就地方志来说，要继承的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继承代代相接、绵延不断的修志传统；二是吸收唯物史观的合理内核；三是发扬经世致用的资治宝鉴作用；四是学习秉笔直书的直笔精神和认真严肃的治学态度；五是光大从实际出发、不墨守成规的精神；六是重视资料工作对修志的关键作用。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旧方志无论在理论观点或内容材料上，都还存有不少唯心的、封建的、有害的糟粕，需要我们清醒而公正的进行分析批判。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天人感应，封建迷信。用民间流行的封建迷信或巫师、方士编造的隐语、预言，作为吉凶的符验征兆；用起源于古代“河图”“洛书”的神话传说，把自然界某些偶然现象神秘化，视为社会安危的决定原因。第二，皇言圣恩，贵族世家。第三，夸称政绩，欺蒙百姓。第四，忠孝节义，维护风教。第五，隐恶扬善，奸宄不载。第六，抄袭拼凑，彰异猎奇。第七，一骂、两缺、三不写。一骂：骂人民大众为愚民、顽民、劣民、盗、匪、贼；两缺：缺经济资料，缺反映规律；三不写：不写人民大众，不写亲、尊错误，不写兄弟民族的团结和进步。

当时，《邓小平文选》已出版，大家正在学习。董一博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思想路线上拨乱反正后，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正确政策，从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纠正了过去的错误，其基本精神体现在《邓小平文选》中。小平同志强调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强调经济建设，强调“四化”是根本任务，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强调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四项基本原则等。所有这些是完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编修新方志必须体现《邓小平文选》所论述的这些观点及其他重要思想。

七 关于地方志的持续发展

董一博在讲话和文章中反复论述了为保障地方志事业持续发展，必须做好以下工作。

（一）设立相应机构。古代修志，至宋已有专门机构，朝廷专管修志的机构称九域图志局，地方修志也设局主持。但修志机构都是临时性的，它只负责编纂一部志书，志书完成，人员四散，下次修志再重新组织。方志大家章学诚曾主张设立常设的修志机构“志科”，志书编完，负责收集、整理、保存资料，以供下届修志使用。但这一主张未能变成现实。民国时期，要求省、市、县设立修志馆或文献委员会，负责收集地方文献，编修地方志书。实际上，由于政局混乱，许多地方并未设立。20世纪新方志编修之初，一些地方的领导人对编纂地方志的意义不认识。有的领导借口忙，难以顾及；有的甚至说当了20年县长，不修志照样干工作。于是，有的地方出现奉命修志、随大流，从各单位临时借调几个人组成地方志办公室，人员的工作关系和工资关系仍在原单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从领导到志书编纂者都抱着“一本书主义”，即地方志办公室的任务就是编纂一本志书，志书出版，他们的使命也就完结了。

董一博敏锐地觉察到，这种氛围阻碍着方志事业健康发展，必须迅速扭转这种不利局面。他认为，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编修新志书是一项重大的文化建设工程，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利国利民、利今人而惠后世的千秋大业。“历史赋予我们更为积极的政治使命，就是作为党委和政府的最为亲密的助手——参谋部和咨询部，为党委和政府积极提供资料，提供方策，作为历史借鉴和现实建设的依据，是我们方志工作者不可推诿的

责任。”^①

要想使修志事业得以良好的持续发展，首先要解决机构问题，即将各地修志机构设置为实体的常设机构，使修志工作有人管理，修志人员有所归属。他指出，应及早建立健全从中央到地方的地方志编纂领导体制，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统筹规划，有组织有领导地把全国的修志工作认真开展起来。他多次在各种会议及与各地领导人会面时，提出“机构常设，级权相应，年龄放宽，人员稳定”^②的建议。他说：我们今天要认识到编修新方志的目的、作用，其历史任务，是要建造一座复杂、庞大而宏伟的文化大厦，不是几个人或某一部分人所可能完成的。必须形成一个党委领导、政府主持的格局，由地方行政第一把手为主修，组成编纂委员会及其办公室，成为一个级权相应的部委和局的单位，更由于这是一项有延续性的工作，故其机构必须常设并发挥其重要作用，否则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使命的。他还上书胡耀邦总书记，要求加强领导，解决问题。胡总书记批示：确要有一个敢抓敢闯的人牵头。胡乔木批示：认真改变目前的状态，调集有志于此者，全力以赴。遇到困难，请按范围分请国务院和各省市县负责解决。批示8个月后，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加强全国地方志编纂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进一步加强领导，充实人员，加强队伍建设，切实解决地方志编纂工作中的问题。……有关编制、经费、出版等问题，由地方各级政府根据实际情况，予以适当解决。”有了红头文件的明确规定，各地修志机构逐步建立健全起来。

董一博还总结有些地方的经验，提出地方志办公室除编纂志书外，还要利用掌握的资料，多出志类产品，当好领导的参谋和助手，以实际成绩争取领导对方志工作的重视。为打消有些志书编纂人员担心志书完成后无事可干、只能另谋职业的顾虑，并保证方志事业持续发展，董一博提出志书出版后，地方志机构需继续完成的12项任务：一是新志书的总结和校勘工作，各种“副产品”的撰写和编辑工作。二是剩余资料的审核、编辑、整理和保存工作。三是继续搜集、考证各种资料，为大约20年后修志，做好充分的资料准备。四是续写新志出版后已故或在世重要人物及志书主修、主纂者的传略，或为新方志立传人物撰写年谱和补证。五是有关地方问题的专题研究，包括地方的自然、社会、人文及百科之业的各种已解决但不确切、未解决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六是旧志和地方文献的全面整理工作。七是编写当地的地方志发展史，整理理论、应用等资料，为研究理论方志学、应用方志学和方志学发展史积累资料。八是编写地方史。九是编写乡土教材。十是进行方志学研究。十一是建立地方志博物馆和信息资料储存总库，并承担地方有关问题的咨询工作。十二是编写地方年鉴。^③他说，只要地方志机构常设了，其工作内容就不仅仅是这些。在新方志编修之初困难重重，许多人尚在彷徨的时候，董一博已经预见到方志事业辉煌灿烂的明天，确实很有战略眼光。后来，随着方志事业发展，方志领域不断拓展，董一博的各项设想逐步变成现实。到现在方志事业已发展为志（地方志书）、鉴（地方综合年鉴）、库（数据库）、网（地情网站）、研（理论研究）、会（学会）、馆（方志馆、方志博物馆）、用（开发利用）、刊（方志刊物）、史（地方史）“十业并举”。地方志事业迎来了繁荣昌盛、兴旺发达的辉煌时期。

（二）培养方志人才。董一博认为，保证方志事业持续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选拔、培养

① 董一博：《论方志的五大作用——在延边自治州地方志学术报告会上的讲话》，《董一博方志论文集》，第310页。

② 参见董一博：《在哈尔滨市全体修志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董一博方志论文集》，第415页。董一博：《在福建省地方志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福建地方志通讯》1985年第6期。

③ 参见董一博：《在哈尔滨市全体修志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董一博方志论文集》，第416—417页。

方志人才。地方志涉及自然、社会、人文和百科之业的历史与现状，没有较高水平的人献身于这个事业，是不可能修出一代名志佳作来的，只有“调集有志于此者，全力以赴”^①，方可取得预期的成效。一代之志，须一代之人才任之。这是修志能否成功的关键。而人才决定于知识，知识又决定于现有的功力基础和掌握信息量的多寡。这就要求方志编纂者有广阔的知识面，有深厚的知识基础，不仅在修志机构整体上的知识结构，而且在编纂者自身，既要有较高的文、史、哲的造诣，也要具备多学科结构的知识面，既要了解旧志，也要懂得点新兴学科，尤应在方志学上狠下功夫。他特别重视主修和主纂（主编、总纂）。他认为，一部志书是编成名志佳作还是庸篇俗作，决定于此的关键因素在于主修和主纂。名志出于名手，没有名手是修不出名志来的。主纂应是文、史、哲的通才，还应对修志涉及的辅助学科加以涉猎，虽称不上一代风流人物，也应是一方风流人物。“他是领导和组织撰（编）纂方志的权威学者，设计施工的总工程师，并负责志书的通纂，是保证志书质量的关键人物。志书的优劣，笔削独断，当系于一身。”^②总纂除对立志宗旨、指导思想、篇目设置、内容组织及资料审核等负有研究、调整、增删、修改之责，而且对于文风、文理及文字等，也负有修饰、润色、改写之权。他还举了李鸿章主修的《顺天府志》为例来说明：此志的主纂先后为张之洞、缪荃孙。缪是光绪二年（1876）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是目录学家、金石学家、文学家。此志的篇目是他拟订的，金石志和艺文志是他编写的，附录是他选定的，其“体例之善，文采之美”，与缪氏的功力是分不开的。

怎样才能使方志编纂者达到方志人才的要求呢？董一博主张，调入人员应是水平较高的适合修志的“有志于此者”；还要加强在职人员的培训，包括以会带训，特别是通过志稿评议会培训，使参会者都受益。他还呼吁高等院校建立方志学系，开设方志学课程，系统培养方志人才，这更有利于方志事业持续发展。

董一博很重视方志人才的修养问题，提出了五方面的要求：一要有驾驭这门学科的学识水平和组织才能。二要有文、史、哲、经专业之长，兼有广阔知识面：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法令、方针等；要学习方志学、方志目录学、方志编纂学、方志资料学、旧志书及其他有关著述；要深入研究与自己编纂的志书相关的专业；要认真学习与修志有关的科学技术知识。三要有洞察古今、左右全局和抉择原则的革命胆识。四要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写作、编纂的才能。五要有忠诚勇敢的献身精神。方志工作者必须在气质修养上狠下功夫。下笔立义，应严肃认真；记功思过，务必实事求是；彰善癉恶，尤应恰如其分。这要以真信念而克邪恶。

当年董一博在方志人才问题上付出了那么多心血。而现在，经过各方面的努力，特别是经过两轮修志的锻炼，方志工作者已成长起来，许多人已成为真正的方志人才。

（三）调动5种力量。董一博认为，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应该集中行政权威、学术权威、行业专家、社会力量、组织家5种力量，全力以赴。这既是修志工作的需要，也是新方志事业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各地的修志实践证明，凡是5种力量组织得好的，志书编写就进度快，质量好；那些迟迟未完成修志任务，或志书质量不高的，都是没有充分调动5种力量。一是行政权威。由地方最高行政领导任主修，既是他应负的责任，也借助其权力之便发号施令。行政权威是推动方志工作的决定力量，是体现“党委领导，政府主持”的关键，修志工作的推动和志书的

① 胡乔木在董一博《给胡耀邦同志的一封信》上的批示，董一博：《关于两个批示的读后感》，《董一博方志论文集》，第165页。

② 董一博：《在滕县谈地方志工作》，《董一博方志论文集》，第371页。

质量,一概决定在行政权威的重视程度及措施是否得力。二是学术权威。遴选通人、学者作为志书的主纂。他既知古,又知今,对地方志及其所志之地方,应有较深的研究,他长于文、史、哲、地,并熟悉相关科学。他是志书的总体设计师,也是施工的总指挥,尤其负责全志总纂,笔削独断。能团结他的副手、各分纂及编辑同人,共同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三是行业专家。“方志面向百科,百科走向方志”,必须邀请各行业的专家或通才,为该行业、事业立志,如老局长、老书记、老工程师,他们了解行业的特点和发展历史,是编写分志的骨干力量,可聘请当编纂、分纂或副总纂。四是社会力量。社会是藏龙卧虎人才密集之地,如学校、研究机关、文化单位、各行各业离退休的专家、教授、工程师、研究人员、老干部、老教师、老工人、老农民等,是修志的重要力量,可聘请他们为编辑、分纂、副总纂,或担负某方面修志工作。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地方志办公室,通过地方志协会组织社会力量参与方志工作,是个好办法。博山区地方志协会吸收了50多名热爱史志的社会人员入会,据其所长安排某种方志工作,促进了区方志工作全面发展。五是组织家。他们是方志编委会及其办公室的实际工作者,是修志各项工作的核心力量,担负着各项宣传、组织、联络、编辑及行政事务工作。他们恪尽职守,是一批最无私、最积极的分子,在上下左右起着纽带甚至是发动机的动力作用。地方志工作开展得如何,往往与他们的努力程度密切相关。

八 关于方志的体例篇目

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之初,方志界对方志的体例篇目进行过热烈讨论。董一博对这方面的研究下了大功夫,他的认识和观点,除反映在基本篇目中,还写有专文,并在一些文章和讲话中反复论述。

综合他有关方志体例的诸多论述,笔者理解他说的体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体例是和内容、篇目、指导思想、修志宗旨联系着的。“它包括类型、书名、断限、体裁、篇目、记事、立传、文体、称谓、出版,以及志、记、传、图、表、录、照,等等,并要体现出各个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所以说,它是对整个志书的总体‘设计’,要求内容和形式的高度统一。”^①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又写道:“志书的体例,基本含有以下的要素:指导思想和宗旨、组织结构、体裁、章法、断限及其它。”^②狭义的体例,“包括体裁、格局、结构、文字的表现形式”^③。我们讨论方志体例时主要是指后者。

关于篇目,他认为,篇目“是志书的大纲和缩影,体现志书的全部内容,如果说体例是志书的总体设计,篇目就是具体的施工蓝图。它是志书体例的派生物,具体体现体例的精神要求,这是编纂志书继体例之后的首要问题”^④。历来编纂方志的形式,大都以类系事,类为一志,横排篇目,竖写事业发展。他把当时方志篇目的形式归纳为4种,并分析了各类的优劣。第一种,三段五级式。把一代一方的万物,以写史的方法,分为古代、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或古代、清代、民国、抗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则史兴而志亡,不可取。第二种,条目体。平铺直叙,一目了然,有一百数十至二百以上者,都是孤立的条目,有类辞书,肢解系统,丧失了大类统属及其有机联系。第三种,类编式。分类似有统属,下属各自平列、孤立。旧志采

① 董一博:《关于县志体例及篇目问题之商榷》,《中州今古》1984年第3期。

② 董一博:《论彻底改变思维方式创新体例》,《董一博方志论文集》,第438页。

③ 董一博:《新方志编纂探微》,《中州今古》1985年第6期。

④ 董一博:《论彻底改变思维方式创新体例》,《董一博方志论文集》,第438—439页。

取这一方式,故把旧志写得无联系,无运动,无生机。第四种,系统编章節目式。这是按系统工程结构分类法,辅以协同机制,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这种方法,既吸收了上述各式的精华,弃其糟粕,又吸收了新兴学科的成就,符合志体的要求。

董一博肯定了第四种篇目形式,并分析了这样安排篇目的优长之处:一是反映结构性。把所记的万事万物,作为各种系统结构的整体反映出来,如实再现。二是多维立体性。这种叙述方法,不是平铺的、片面的,是以多维组成主体透视的整体。三是百科组织性。方志面向百科,百科走进方志,从无序到有序,尤便于百科人写百科志,避免了分类不清,结构重叠。四是囊括宽宏性。把自然、社会、人文和百科之业,都按系统、级别囊括起来,一览无余。五是联系运动性。因为用多维的系统组织,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着的,不是呆板的、不动的,而是活的、运动的。六是协同机制性。所记各种系统,都是互相作用和反作用的,大小协同,在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又互相关联。七是规律自显性。这样的记载方法,不总结经验,经验自明,不探讨规律,规律自显。八是方法创新。这种方法体现了识、变、制原理,用哲学解决认识问题,用技术解决方法论及其机制问题。

董一博分析了应根据什么来制定篇目的问题:一是参考历代的篇目,从历史上寻求借鉴;二是从本县的现实条件及特点寻找根据;三是认真研究上级及地方志协会的要求,参考兄弟县的篇目。他特别强调了拟订篇目须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基本篇目只能作为参考。

关于篇目形成过程,他认为,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修志之初,要研究拟订出篇目初稿,作为收集资料的提纲。第二阶段,随着资料的增多和认识的提高,会发现篇目的不当之处,须进行调整,而且不止一次。第三阶段是在志书定稿时,再次全面修订篇目(含标题),使之成为正式目录。从首轮修志实践看,关于拟订篇目三个阶段并若干次修改的判断是符合修志实际的,大多数市县志的篇目只印出的就有若干稿,有的甚至达十稿以上。

关于篇目内容构成,董一博先是主张分为概述、大事记、各分篇、人物篇、附录五大部类。1986年,他在山东省滕县地方志工作大会上的讲话中,对这五大部类进行了详细阐述。后来,他的认识又有发展,在1987年发表的《论彻底改变思维方式创新体例》一文中,他提出了系统工程网络结构的设想。他说:“世界上没有无系统的事物”“地方志正是反映记载自然系统、社会系统、人文系统、百科之业的历史及现状大系统的综合性应用科学,可以说它是记述这些事物动态的最科学的方法,这就是系统方法。”^①又说事物的结构“是按一定规律有机结合的整体。构成事物内部结构的各个要素(成分)之间是互相制约,互相作用的,其结果,必然要影响事物的外部表现”^②。按此设想,提出六大部类:概述、大事记、系统分篇列目、协同机制、人物编、附录。与五大部类比,主要是增加了协同机制部类。下面将他对六大部类的论述作简要介绍。

(一)概述。从宏观角度纵谈本县古往今来,横陈大势大略,夹议兴衰荣枯之由,策论优劣之势和发展趋势。居全志之首,为全志之纲。概述是为弥补各分志孤立记载一类事物而造成全志整体性不足而设立的,是首轮修志之初的创举。

(二)大事记。用编年体记载本地大事要事,是志书之经,在全志中起贯通作用。“其体属编年,既不是纪事本末,也不是编年与纪事本末相结合,只是以时系事,按时序记条目。”^③大

① 董一博:《论彻底改变思维方式创新体例》,《董一博方志论文集》,第446页。

② 董一博:《论彻底改变思维方式创新体例》,《董一博方志论文集》,第449页。

③ 董一博:《关于县志设置“概述编”之商榷》,《中州今古》1985年第1期。

事记应置于各分志之前，因为有了编年记事之经，然后才能编纬（分志）。不能分为几部分，因为肢解之后，就不成其为纵贯线了。

（三）分志。是志书的主体，为全志之纬。包括入志的百科之业，记其兴衰荣枯，发生、发展及现状，上下左右关系，在社会及各行业中的网络机制影响作用。

（四）协同机制。“这是一特定的编章。它的作用，正如它的名字那样。因为我们所记载的各项事物或事业，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静止的，它是运动的、发展的，是相互联系的，是相互起着作用反作用的，在制约着、推动着和影响着的，借此理出全县宏观机制和微观机制的线索和出路来，在全书的发展上起着配电盘的作用。”^① 首轮修志后期中小编体的县志，多设置这一部类，如经济综述、政事纪略等，对加强志书整体性起了重要作用。

（五）人物。包括人物传、人物表、人名录。“立传入志，不应以职级为标准，而应以其为人及业绩，并以表彰、戒惩为标准。”^② 要坚持生不立传原则。为人物立传，“是一个最敏感的问题。给已故人物立传，做到公允，让社会满意就很难；如果给活人立传，更会引起纠纷，不易处理，并且难杜请托曲笔之事”^③。“如果有人问，生人可否立传，我就会干脆回答：不能！”^④ 现在看，第二轮修志初期，有人主张用人物简介的形式为生人立传，是考虑欠周的。“如果遇有特殊事迹（迹）而人尚在世间者，如记其事及其人，也只能‘以事系人’‘记事述人’。”^⑤ 立传入志，以本籍为主，以正面人物为主，以人民大众为主，以近现代人物为主。人物传的排列，主要有历史分期法、领域分类法和生卒年排列法，一般采用卒年排列法。

（六）附录。收录没有记入正文又有重要价值的资料，包括文献辑存、考略、历次修志述要等。需要指出的是，他将新志编修始末也收到附录中，则有欠妥当。修志始末有的志书称后记，是一独立的部分，应置于志书最后。

董一博指出，新方志的各编章，是由各系统的事业按其性质范围组成，上列五大或六大部类，“基本上构成了地方志的总系统，据此，各分编系统之下，又分别以子系统立志，构成其所在的母系统，就这样由大大小小的系统、前后层次组成新方志的系统工程。……各系统自身是个立体的网络结构，各系统又以立体网络结构，构成志书运动的整体”^⑥。

首轮修志前期出版的志书，基本上都是按上述五大部类或六大部类来编写的。后期，在专家建议下，大家逐步认识到，地方志书这种大型著述，为方便读者查阅利用，需编制索引，于是增加索引。

九 关于概述

概述是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之初新创的体裁。董一博极力倡导设置概述，在文章和讲话中一再阐述这一主张，并连续发表了3篇专文进行论述。他为概述在新志书中的确立作出了特殊贡献。董一博是从县志各部分及其内容构成来看待概述定位的。他认为，概述应作为特殊的一篇，概述全书。“这样，分志横剖，大事记纵贯，概述则摄取全书各分志平列内容之精华综要而述

① 董一博：《论彻底改变思维方式创新体例》，《董一博方志论文集》，第449—450页。

② 董一博：《在全国北片十三省市“县志稿”评议会闭幕式上的讲话》，《黑龙江史志》1981年专辑。

③ 董一博：《在滕县谈地方志工作》，《董一博方志论文集》，第369—370页。

④ 董一博：《在全国北片十三省市县志稿评议会闭幕式上的讲话》，《黑龙江史志》1981年专辑。

⑤ 董一博：《在全国北片十三省市县志稿评议会闭幕式上的讲话》，《黑龙江史志》1981年专辑。

⑥ 董一博：《回顾与思考》，《董一博方志论文集》，第466页。

之,便构成全志的立体画面,既要横剖编章节见其横断面的种种,还可以大事记纵见其发生发展的原由,进而又有概述统其全部而构成立体形态,阅读全书,不需多长时间就能从概述中挾取其概要精华了。”^①综合董一博有关概述的论述,将其主要内容分析如下。

(一)设立概述的意义。董一博认为,旧方志的体例篇目是以事分类,以类横排。这种横向排列的大小方块,各自独立的自剖自战,在编与编之间、章与章之间、节与节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叫作各栏各界、鸡犬之声不相闻,构成各自孤单的封闭个体。对此弊端,古人早以见及,并设法补救。南宋淳祐《临安志》、明景定《建康志》等志书都在各篇之首设小序,章学诚改称序例,除说明本篇大要外,重在阐明义例。至民国,黄炎培修《川沙县志》,在每卷之首设概述,阐明内容概要及义例。黄氏在《导言》中说:“‘概述’有类实斋所为‘序例’,而实则不同。盖重在简略说明本志内容之大要,而不尽阐明义例也。”^②这种补救方法,只解决方志中的部分问题,对方志中的整体问题并未解决,而方志体例的致命缺陷仍然存在。只有在志首设概述,才能解决分志间的割据状态和述而不论等弊端,并概其长短优劣之势,述其振兴韬略之策,达到更加科学的实际效果。有了概述,就能抓住这部志书总的特点、地位、作用、问题,最有使用价值的优势及必须避开的劣势等。概述不仅对本书所记本地的历史和现实起到“导游”作用,尤其能给人以总的和起核心作用的认识。如需验其真伪,剖其细微,可阅读有关章节。这样便节省了时间,获取了阅读志书的指南,为进一步深入探讨和扬长避短,为我所用,提供研究的阶梯和问津的宝筏。

(二)概述的作用。董一博总结了6个方面:第一,立体鸟瞰全志。编写概述,要把立足点移出本地,站到更高更广的大范围,以高屋建瓴之势,权衡本地今昔及未来。第二,打破园囿,使门内外比比相通。概述将块块状态打通了,把全志所记自然、社会、历史及现实的百科之业,都措置在不断运动、变化、演变和发展之中,并力求揭示这种联系和发展的内在联系。第三,关系明确,因果相望,揭示规律。概述把事事物物组成相互联系的整体,将相互联系的发展运动、趋势及其规律揭示出来,则各种关系的因果自彰。第四,扬长避短,开发优势,示人以康庄大道。不仅丰富并完整了方志体例自身的组织结构,也深化了方志的实用价值。第五,申大势,说大略。主纂纵论天下,概地方优劣之势,述兴衰利弊之由,以居高瞻远之韬略之笔,唤起人民爱乡爱国之雄心壮志。第六,节时捷取,符合认识规律。撰写者通过全面分析与综合,把握全志所有事物的现象与本质,升华为理论的和规律性的认识,作为导引方便读者,为读者节约时间。

(三)概述的写法。董一博通过与分志等部分的对比来说明概述的写法。首先,各分志必须在境域内或本编章内写自己的内容,横向排列,纵述事实,有叙无论;而概述则着眼于在本省以至全国的地位,从自然、社会的历史及现实中看本县的总貌、特点,它可以总论大势大略,还可以谈本县的优劣之势,总之,既可纵论,也可横评,允许突破述而不论的限制。其次,各分志原则上是面面俱到,记述事实,而不探索规律,不为读者作出现成的结论;而在概述中,则必须提炼材料之精华,探讨经验教训和规律性,为读者提出结论性的意见。再次,概述在各分志完成之后编写,权衡兴衰利弊,剖析优劣得失,真正起到战略决策的作用。

(四)概述的内容。董一博在《关于县志设置“概述篇”之商榷》一文中,将概述的内容总结为五方面:一是本县的发展简史及现状,在全省以及全国的地位。二是在全省全国占有位置

① 董一博:《关于县志设置“概述编”之商榷》,《中州今古》1985年第1期。

② 黄炎培修:民国《川沙县志·导言》,“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28页。

的突出事件。三是在全省全国有影响的新旧人物。四是抓特点，抓规律，抓经验教训，抓最为突出的问题，抓当前的优劣之势，抓扬长避短，借作战略决策的依据。五是它是一个鸟瞰的历史画面，是运动的，变化的，也是发展着的，能给人以前进的力量。随着认识的提高，对设置概述思考的深化，在《再论“概述篇”的设置问题》一文中，他把概述的内容归纳为六方面：第一，从本省或全国的角度，写本地的大势大略，阐述锦绣山河今昔地位之要。第二，畅谈本地长短优劣之势，兴衰治乱之由，总结经验教训，探讨客观规律。第三，摄取主要物产资源，水利、交通之便，论工农业的发展状态及其趋势，兼及金融财贸、名产特产之盛。第四，在省内外有重大影响的重大的事件，以作功能鉴戒之资。第五，例列著名历史人物、现实名人、闻人并及奸宄，以激千秋爱憎。第六，重要的古迹名胜、特种工艺、新生事物、优良风尚及陋俗，以启思古之幽情，而发建设之壮志，持纲振纪，移风易俗。

董一博三论设置概述的文章影响很大，方志界就概述设置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并形成共识：县志、省志、市志等各种志书都设置概述，概述成为志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十 关于方志资料工作

董一博认为，资料是编修方志的基础。如果没有大量可靠的资料，修志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资料的来源主要有实物（如考古遗迹和一切有资料价值的现实存在物等）、文字（如各种文献、档案、报刊、著作、铭刻等）、口碑（如传说、民歌、民谣、民谚、方言等），还包括为工作、生产、学习和科学研究等所需而搜集或编写的一切内部或公开的材料，通常指书报、期刊、小册子、简讯、汇编、图表、统计报表等。按内容，可分为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社会、文教、科技、人物、自然及其他类资料，每类资料都细说了具体种类。他重点阐述了资料的收集、整理和核证。

（一）广征博采。董一博认为，编修方志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资料搜集和研究的过程。拟出资料纲要目录后，就可据此组织力量进行收集了。主要步骤如下：第一步，查阅文献。包括有关史志书籍、各种著述（含出版与未出版的文章、日记、手稿、函电、证录、谱牒、报纸、杂志）和各种其他文字记载。第二步，查阅档案。档案是机关、部队、团体、企事业单位、某些活动家，在工作和各种活动中所形成的历史证录，以及各种事物发生、发展的现象及实质的宝贵资料财富。第三步，考迹验物。地形地貌、山川河流、古建寺庙、墓葬、石窟、碑刻、器物及历代文物等，都是说明历史真貌的根据。第四步，录述口传。访问故老，征求亲见、亲闻及传闻，进行专访、通讯或开调查会。第五步，广征藏书。书籍有秘本、珍本或孤本，对修志用途甚大，应广泛宣传，征集民间藏书及各种资料。第六步，兼容并收。凡属与方志有关的资料，本着正反兼收、多说并存的原则，对敌人、朋友、上层、下层、善恶良莠、中外古今，不论文字、实物、口传等类资料，本地外地列入或未列入资料目录的，皆在收集之列。第七步，运用各种方法。收集资料要做到六勤：目勤以阅读观察，口勤以问古访今，耳勤以听口传资料，腿勤以奔走四方，手勤以摘录抄记，脑勤以分析综合。同时，为了提高效率，保存原真，尽量使用现代化手段，如电子存储、胶卷储藏、录音、录像、复印、模拟复制等。第八步，记全要素。如类别、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情节、关系、结论及问题等，尽量记全。比如调查一个历史人物，举凡音容笑貌，举止风度，饮食服饰，习惯嗜好，爱情关系，得意与失意之事，喜怒哀乐之情，待人接物之风格，治家教子之言行，政治态度，社会活动，友谊往来，亲族关系，重大事件在外表态及在家流露，思想矛盾，胜利得意之态，失败绝望之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之争夺，法庭、监狱之表现，诗文、函电、贺信之记述，茶余酒后之浪语，坎坷病中之感慨，追忆往事之悔

恨,弥留之际之遗言,以及各种斗争之表现,都应不厌其详,不嫌其复,精心细致地探索与搜集。

(二) 分类整理。董一博认为,整理资料是编纂方志中的重要工程,也是关键环节。整理,不仅要把各种零散的资料予以综合,尤其要凝聚成修志所使用的分类素材。整理按篇目进行。主要步骤如下:第一步,登记入表。列明编号、题目、来源、时间、内容、页数、字数、出版或收藏家、注释、问题及意见,附原件、附件、征集者等。第二步,分类编号。按编分类,下领章节目录,立为专篇资料。或按专题、时间分类,立为专题资料。或按文字资料、形声资料分类等。第三步,立卡保管。如纪年卡、专题卡、专目卡、人物卡、地名卡、分解卡、索引卡、加工卡等,要一事多卡互见,要统一编号,使篇目、索引、资料三卡统一,原文卡与分解卡并存,加工卡与根卡并存。第四步,汇编资料。对原始的繁杂资料,在登记、分类、立卡的基础上,进一步列队排比,制成资料汇编。第五步,资料长编。按篇目和编志的要求梳理资料,组织成长编,为编写打好基础。

(三) 审核鉴别。这是保证志书质量的关键环节。为确保资料真实,对征集来的资料必须严加审核鉴别。一般是抓时间,考特征,明变异,扶格局。不主观臆测,不固执己见,要进行精确考证,可运用人证、物证、书证、理证、时代证、地域证、民俗证、方言证、物理证、化学证、比较证、反证等科学方法。在文字校勘上,陈垣的“校法四例”,即对校、本校、他校、理校,颇有参考价值。

(四) 保存管理。董一博认为,应将资料分门别类,各按系统分别立卷标题、编号、上架保管。订出目录,每号一目,一目有档号、标题、卷数、起止年月等。

他指出,资料工作要充分利用社会力量。离退休的老红军、老干部、老学者、老民主人士、老艺人、老工人、老的旧军政人员,是资料工作的“老子方面军”^①。这一支队伍是非常强大的,有学问,有知识,有亲身经历,掌握着别人所不知的资料,只要发动起来,就能发挥很大作用。这部分人大多年事已高,资料之于老人,是个“生死存亡”的问题,生则存,死则无。因此,“抢救”是个紧迫的任务。他认为,也可通过恰当形式,组织在职人员参与资料工作。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联合山东大学历史系,组织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从“二十四史”中摘录山东历史人物的资料,是个好经验。各地可由此受到启发。

十一 关于方志评论

董一博所说的方志评论,主要是指志稿评议会和方志刊物发表各种评论志书优劣的文章,评论的对象是新编志书、志稿和旧志。他把方志评论的地位看得很高。他说:“开展方志评论,是我们20世纪方志工作者打翻身仗的一支劲旅,必须与纂修、整理密切配合,获得相互支持,三翼齐飞,而评论更须做各方面的艰苦工作。评而有据,论而有理,这就需要扎扎实实地进行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提高水平,培养人才。把这支队伍建设成中国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开拓者,自觉的、科学的先进战士,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以坚定的立场、清醒的头脑、科学的态度和战略家的眼光,进行评论工作,为提高整个方志工作的水平做出贡献!”^②关于方志评论,他主要阐述了以下问题。

① 董一博:《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在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董一博方志论文集》,第7页。

② 董一博:《开展方志评论提高修志水平》,《中国地方史志通讯》1985年第3期。

(一) 方志评论的意义。董一博指出,失去争论的世界是冷清的世界,缺乏争论的理论是没有生命的僵化理论。人类世界和宇宙一切事物是在实践和争论中被认识,新的理论是在实践和争论中诞生出来,一切真理是在实践和争论中被确立。方志工作中的志观之是非、志材之真伪、志法之优劣等问题,只有在实践和争论中才能解决。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理论也只有在实践和争论中才能建立起来。而方志评论,恰是促进新方志事业发展的动力,是新方志理论研究的反馈器,是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理论产生的催化剂。通过方志评论,使志书编纂和方志理论研究更上一层楼。方志评论是为了总结方志工作的经验教训,提高新编志书和旧志整理的质量,进一步编好新志书,整理好旧志书,使地方志工作更好地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二) 方志评论的功用。董一博指出,方志是一个时代的标识,同时也标识着那个时代的编纂者和评论者的水平。一个时代的名志佳本或者是简陋之作,固应首推编纂者,但是,尤赖评论家的慧眼妙笔评其得失,论其正误,对是非、真伪及臧否问题,可质言而证,进一步对志观、志材、志法、志言、志德等述其究竟,将方志工作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出现一批方志评论家和出现一批方志编纂家,是具有同等意义的。

方志评论,不仅具有起生开路、纠谬补缺、扶正培本的功能,而且能积极热情地为旧志整理和新方志编纂服务。它既能对旧志整理进行正确分析批判,又能大胆勇敢、谨慎清醒地继承其珍贵之处,而对新志则能克尽扶持,明是非,定真伪,别臧否,体用建设,示人以康庄大道。

举行志稿评议会,大家针对一部志稿进行评议,也是培训方志编纂人员的好方法。在评议过程中,围绕着解决问题,选择最佳方案,树立标杆条件,让大家有章可循,有则可依;对所评议志稿,着重看是否符合志体,篇目安排是否恰当,是否贯彻了“三新”精神,文风是否端正,能否起到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等。有部具体志稿摆在那里,大家有的放矢地进行讨论,互相启发,互相补充,共议共评,同受教育,共同提高,对志书应该写什么,应该怎样写,会有深刻认识,甚至比单纯的讲课培训效果更好。从首轮修志以来,召开志稿评议会,成为编修志书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

(三) 方志评议的要求。董一博指出,方志评议要注重以下要求:一是遵守四项基本原则。方志评论志在拨乱反正,扶正培本,即纠正两千年来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唯上、唯书,以返归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复原历史真实面貌。因此,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二是在学术上坚持人人平等。对一切新事物的认识,新理论观点的形成,都不是一次成功的。因此,要允许探索者失误。我们主张共同研究,共同探索,虚怀若谷,相互学习,为共同制定最佳方案而取长补短。三是坚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原则。讨论问题只能从实际出发,以符合实际的、恰如其分的标准,衡量志稿,分析优劣,提出中肯意见。四是坚持满腔热情,肝胆相照。地方志是门新学科,自身尚不健全,所以失误和犯错是难免的。如果是自己错了,就要老老实实承认;别人错了,要帮助改正。他人的成绩,应为之感到光荣,向人家学习。讨论问题时,要注重尊重对方,以理服人。五是质量标准。即观点正确、方法辩证、资料翔实、体例完善、篇目合理、特点突出、文风端正、实用性强。现在评论志书优劣可依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制定的《地方志书质量标准》。

董一博所说方志评论的对象仅限于志书,包括志稿、新编志书和旧志。后来将方志评论(又称方志批评)对象的范围扩大了,包括地方志书和整个方志工作。

十二 关于旧志整理

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之初,有些地方的修志者和领导者对旧志整理工作不重视,认为修新志都忙不过来,哪有精力和时间整理旧志。而董一博认为,编写新志和整理旧志是方志工作的两翼,应同步进行,互相促进。1982年5月、1983年4月,他以中国地方志协会副会长的身份,分别参加了在武汉、洛阳召开的地方志(含旧志整理)规划会议。1984年3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立旧志整理工作委员会,董一博任主任。在他主持下,委员会每年都召开会议,制订了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中国旧方志整理规划》《中国旧方志整理规划实施方案》,着手整理工作并取得初步成果,旧志整理工作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总结他关于旧志整理工作的讲话和文章中的有关论述,他的主要观点如下。

(一)旧志整理的意义。董一博在《中州今古》1984年第4期发表《发掘、整理方志资料是两个文明建设的当务之急》的文章,文中引用中共中央决定和周总理讲话中的两段文字来说明旧志整理的重大意义。他分析,党中央和周总理的指示充分说明党和政府对于发掘、整理旧方志工作,一贯十分重视。当前,要搞好社会主义建设,不仅要懂得今天,还要懂得昨天和前天。这就要借助于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而旧方志正是遗产宝库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历代一统志,省、府、州、县志,镇、村、学校、山川、寺庙等志,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有许多实用价值和科研价值都很高的资料,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地情、史情等一系列重要的实用信息和科研信息,为各级政府的决策提供比较可考的历史依据,为施政提供历史借鉴。总之,旧志资料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旧志整理的任务。董一博依据《中国旧方志整理规划》及其《实施方案》,指出旧志整理的基本任务:一是编制方志目录。包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方志目录,台湾收藏方志的目录,外国收藏中国方志的目录,中国地方志佚书目录,全国的地方志联合目录等。二是编写地方志提要。包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志提要、方志源流考,各省、地市、县地方志述要等。三是编辑地方志资料类编。《实施方案》列出的类编种类很多,各地可根据自身力量办,可先汇编本地最需要或最有特色的种类。四是点校或原版重印志书。先选善本、孤本、手稿等志书,也可选一部分具有使用、保存价值的志书。五是辑佚。有较大价值的已佚志书,凡存有编纂者、书名、篇目及内容大要而又散见于他书者,可辑原或部分辑原予以保存。工作重点首先是整理经济资料,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三)旧志整理的方法。董一博提出的方法主要有:一是全国成立旧志整理工作委员会,负责制定整理规划,召开有关会议,并进行组织、指导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成立旧志整理工作委员会,负责本地的旧志整理和出版工作。二是把整理旧志和编写新志结合起来,把摘抄汇编旧志资料和广泛社会调查结合起来。这样,既能保证资料的完整性,又能加快整理工作的进度。三是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可组织高等院校、研究机关人员和离退休有这方面特长人员参加旧志整理工作,分给一定任务,也可承包或联合承包一部志书,规定完成的时间和质量标准等。

董一博关于旧志整理的设想逐步得到实现。首轮修志期间整理出版了一些旧志书,但主要是类编旧志资料。第二轮修志期间整理出版旧志书工作大发展。除了市、县分别整理出版本地志书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志办公室主持统一整理出版本地旧方志集成。先是广东省出版了全省的旧方志集成,后来许多省的旧方志集成也陆续出版。旧志中的有用资料和新编地方志一起,正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各项工作中发挥作用。

余 论

在拜读董一博的文章，总结他对方志学的贡献时，笔者反复思考，他为什么能在短短几年内写出 160 多万字的文章和讲稿，为建设新方志学作出那么大贡献呢？归根到底是因为他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挚爱，他把修志看成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事业，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而且能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所以，他自进入方志大门，就全身心地、忘我地投入到方志事业中。当时，他已是古稀之年，身体也不好，就凭着对方志事业的挚爱，凭着想尽快促进方志事业发展的激情，他北到黑龙江，南到广西，东到山东半岛，西到新疆，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他走到哪里，就将对方志事业的挚爱传播到哪里，将修志的重大意义宣传到哪里。每到一地，他参加会议，发言讲话，传授方志知识和理论；调查研究，了解修志中遇到的问题，探讨解决的方法。他联系了数以千计的方志工作者，并书信往来，给予热情的支持、鼓励和指导，表现出对方志人才的浓浓爱惜之情。每到一地，他都要会见主要领导人，宣传地方志。他认为，领导的重视和支持是修志工作顺利发展的关键。有的领导人忙，他就等，甚至用赠送自己的书法作品来促成尽早会见。

他对方志事业的挚爱和激情是发自内心的，除渗透在每篇文章的字里行间，也会时不时地很自然地流露出来。所以，在香山会议上，当“李明同志悄悄向我表示修改的决心，我便立即产生一种崇敬的心情，和他亲切握手，表示祝贺”^①！当他在北京安贞医院的病榻上，看到《文汇报》载“舞阳县尊师新规定，有突出贡献者载入县志”的消息，“辗转回味，喜慰非常”！即写信给邵文杰并转省编委，“专此向你们和舞阳县委、县政府及县志办的同志们致以亲切的敬意”^②！当听说山东省桓台县马踏湖尚未竣工的五贤祠是群众自发捐款修建时，他为老百姓重视文化建设的精神所感动，立即主动提出书写匾额和对联。他来到山东淄博，“看到‘人民无处不春风’的情景，却使我增加了亲切之感和无名的责任压力！不禁自问：‘我对淄博能有什么贡献呢？’使我陷于沉思”^③。当得知淄博和哈尔滨两市志办公室结为姊妹志，他立即认为这是新生事物，是一种很好的协作形式，值得祝贺和推广。他到潍坊，促成潍坊、哈尔滨、徐州、常州、马鞍山 5 市志办结成姊妹志。^④正由于他对方志事业认识深刻，所以当几乎所有方志界人士还抱着“一本书主义”时，他已预见到方志事业发展的光辉前景，提出了志书出版后的 12 项工作。令人扼腕的是，当全国修志刚出现如火如荼、蓬勃开展的大好形势，正需要他大显身手的时候，他却突然走了，给全国修志者留下了无限的惋惜和思念！

在第二轮修志即将全面胜利完成的时候，缅怀为建设新方志学作出了杰出贡献的董一博，不仅要学习他的方志学理论，更要学习他热爱方志事业、全心全意献身方志事业的精神，为建设、完善新方志学，编修出更多高质量志书，促进方志事业持续发展而努力奋斗！

（作者单位：山东省地方史志研究院）

本文责编：程方勇

① 董一博：《〈如东县志〉评议》，《董一博方志论文集》，第 342 页。

② 董一博：《舞阳县规定先进教师入志可喜可贺——给河南史志编委的信》，《董一博方志论文集》，第 180 页。

③ 董一博：《在淄博市地方志会上的讲话》，《董一博方志论文集》，第 354 页。

④ 参见邵长兴编：《董一博从事方志理论与实践活动纪事》，1986 年，《董一博方志论文集》，第 510 页。